

阿拉伯妇女笔谈

[沙特] 巴萨姆·伊利亚斯

[埃及] 阿米拉·哈瓦斯克 艾依曼·绍基

编者话：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遮蔽，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形象总是给人们留下守旧、传统的刻板印象，而且人们也很少有机会听到来自阿拉伯女性世界发出的声音。为此，我们组织了以下三篇译作呈现给读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有一些更真实的认知。

巴萨姆·伊利亚斯：虽然人们通常总觉得阿拉伯世界女性是受压迫、受歧视的弱势群体，但值得一提的是，提到女性的地位问题，往往会有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自豪地说，女性的尊严从《古兰经》开始。诚然，伊斯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蒙昧时期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宣布她们应当拥有财产和其他权利，并且规定了具体措施帮助她们对抗丈夫和主人的奴役，保护了她们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力图使两性地位平等和谐。然而，造物主赋予人类的这种和谐往往被破坏，伊斯兰教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受到许多地方顽固传统的阻挠和修正，穆斯林国家往往没有按照伊斯兰教的精神给予妇女正当权益，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谐之美便成为阿拉伯

各国有识之士世代追求的目标。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奋斗，今天的女性境况如何呢？

由于幅员辽阔的阿拉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去甚远，生活面貌也大相径庭。

在严守教规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女孩长到女性特征渐渐明显时必须依照穆斯林的传统戴上面纱，甚至有的小女孩刚刚学会走路，一旦外出，家长也会给她们戴上头巾。女学生上学要去专门的女子学校，从小就形成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成年后出门更是黑纱蒙面，黑袍裹身，同时还要一位男性寸步不离地陪同，女孩出嫁前这位男性是父亲或兄弟，婚后就是丈夫。沙特女子完成学业后，大多是不参加工作的。她们与社会的接触，仅限于在家人、丈夫带领下参加家庭聚会或其他一些交际。在一般的聚会上，男女宾客各处一室，只有在亲情关系很紧密的小型家庭宴会上，男女才可同室进餐，但不允许男女混坐，更不用说交谈了。

沙特并不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女性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只有为维护“男女授受不亲”之传统而设立的女子学校、女子银

行等单位才不得不聘用女性工作人员。2004年6月,沙特政府在大多数领域取消了女性从事工作的禁令,这一方面是对国际社会要求其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呼声的响应,另一方面经济压力也起了部分作用。然而不幸的是,沙特的改革正在受到反对者的抵制,女性仍被禁止驾车,2005年的地方选举投票她们也未获许参加。

直到2001年底沙特女性才拥有国民身份证,此前她们的身份都是附在父亲或丈夫的身份证里。是否让女性拥有身份证,曾在沙特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认为,女性必须头戴面纱,禁止向家人及丈夫以外的人暴露自己的面孔及秀发,但身份证贴上照片后,任何人都能看见其面貌,势必破坏清规。争论的结果,持赞同意见的人占了上风。最后,沙特政府于1999年决定,同意女性拥有个人身份证。新办法规定,女性拍摄身份证上的照片时必须戴头巾,不得化妆;向户籍官员送交身份证照片时,必须装在信封里,由户籍官员用电脑扫描。沙特女性身份证这一公民重要个人文件的缺失或者说姗姗来迟,与沙特女性远离社会和工作岗位是互为因果的。

沙特女性绝大部分没有工作,又无处娱乐消遣,加上生活条件优越,家务有女佣操持,除了带孩子,根本没有其他任务,于是逛商场成为沙特都市女性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利雅得有很多大型的购物中心,规模和档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购物中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集服装店、餐厅、儿童游乐场为一体,连奢华的好莱坞皇家饭店都可以在购物中心找到一两间,各种名牌服饰更是应有尽有。在这个清规戒律繁多的国度,为女性设立购物专区成了一种商业竞争的手段,有的购物中心专为女性特设一个楼层。这样的楼层只能乘坐女性专用的电梯到达,上面设有古董店、餐厅、银行、美容店和其他只跟女性有关的东西,甚至所有的警卫和店员都是穿着西式服装的女性。女士们来此购

物可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脱掉黑袍,穿着里面的西式新潮时装,在这层楼不透明的玻璃环绕中自由徜徉。

如果说沙特是阿拉伯世界保守的极端,那么黎巴嫩无疑是开放的极端。黎巴嫩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闻名遐迩的美女之乡,而且那儿的美女无论对同胞还是外国游客都毫不吝啬地展示自己的美貌,她们甚至曾经多次戴上世界小姐的桂冠。在贝鲁特等都市的街头漫步,到处可见明眸皓齿、婀娜窈窕的美女,特别是在贝鲁特东部的基督徒聚集区,那儿坐落着阿拉伯世界较为少见的众多夜总会、酒馆、赌场、跑马场等娱乐场所,街头更不乏打扮既入时又开放的美丽女子,跟纽约、巴黎街头的摩登女郎毫无二致,令外来游客流连忘返,难以相信自己身处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都市。贝鲁特的繁华与喧嚣同其他很多阿拉伯城市古朴宁静的氛围形成巨大反差,黎巴嫩女性享有的自由也大大高于别的阿拉伯国家,她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与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

即使如此,在政治生活领域,黎巴嫩女性仍然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难以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此外,据黎巴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黎巴嫩女性就业人口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虽与沙特女性的状况有本质区别,但女性的失业率仍然远远高于男性。在薪酬方面,虽然没有歧视妇女的明文规定,但女性的平均工资也要比男性平均工资低百分之二十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阿拉伯女性的地位和生活面貌不仅因具体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说在埃及,几百年来,女性服饰中宽松的阿拉伯大袍、头巾和面纱不仅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别有一番风味的阿拉伯民族服饰。但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渗入,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埃及各大城市的

很多时尚女性都揭开了面纱,脱下了掩盖曼妙曲线的大袍,穿上了巴黎最新款的时装。开罗有一位名叫苏珊的年轻女性,前几年常常穿紧身牛仔裤和短裙,要是在海滩或泳池,她更是会大大方方穿上比基尼泳衣,与西方新潮女性无异。而现在,她却重新穿上了较为传统的民族服装,甚至戴上了头巾,并引以为荣。近几年,在埃及像她这样做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

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历来在巴以等重要问题上奉行单边主义,“9·11”事件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对穆斯林有歧视倾向的措施和做法,于是引起广大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很多人决定放弃西式穿戴和相关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复兴受到了鼓励,阿拉伯各国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的次数也在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的埃及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脱去了西式时装,不再把面纱、头巾看做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桎梏,而是有了全新的想法。

一位名叫玛哈的埃及年轻女性深有感触地说:“自从重新戴上面纱,我学到了很多伊斯兰教的知识,我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很少生气,更有耐心,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保持平常心。”而女飞行员娜伦·塞勒姆终于能够戴上头巾和面纱飞行时,就显得更加激动了。当她一身传统打扮上班时,公司曾经指责她没有穿戴公司所要求的统一服装,但她认为,戴面纱并不影响她做任何事情,况且,谁也没有权力阻止或强迫任何女性戴上面纱。在法庭上,她与上司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穆斯林女性员工为争得穿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工作的权利与上级斗争的事迹,在旅居西方国家的阿拉伯女性中也屡见不鲜。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选择戴面纱呢?这个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激烈讨论。一些人认为,女性

重新戴面纱是从众心理的作用,特别是处在这样一个反美情绪高涨的特定时期和氛围中,她们这样做被视为是一种回归的表现,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这种传统表现,为她们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女性将承受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面纱可以“保护”阿拉伯女性,这是因为它传递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她们是传统的,而不是倾向西方的。更进一步地说,阿拉伯女性戴面纱作为宗教的表述,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在伊斯兰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面纱具有双重意义。然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阿拉伯女性重戴面纱表明阿拉伯女性解放的倒退,也说明了伊斯兰文明中男性统治地位的强化。早在二十世纪初,埃及的卡西姆·艾敏就发表了题为《解放妇女》的著作,他在书中建议,无论何时,女性都可以戴面纱遮掩脸部,但这不应该是强制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阿拉伯现代社会女性们的生活面貌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多变,但总体来说是在日益进步和改善的,同时她们自身也在不断提高认识和觉悟。我们坚信,在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她们一定能享有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牛子牧 译)

阿米拉·哈瓦斯克:在阿拉伯历史上,阿拉伯妇女经历了漫长的黑夜,到处都是男尊女卑的传统,妇女的苦难远比阿拉伯沙漠还大。她们身上的镣铐,灵魂上的枷锁,整整奴役了她们几千年。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贾希利亚时代的阿拉伯妇女曾经是父亲或者自己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剥夺了她们在生活各领域和婚姻问题上的基本权利。当一个男人再娶一个老婆的时候,他就开始虐待以前的老婆。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女人生了个女儿时,因为担心这个女儿以后会给家里人带来耻辱和贫穷,就会马上杀死她。贾希利亚时

代的阿拉伯妇女就这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压迫、剥削、奴役与苦难,一直到伊斯兰教的出现,伊斯兰教一兴起(公元622年)就改变了这一切。伊斯兰教给予阿拉伯妇女各种各样的生活权利和生活自由,她们开始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待遇;无论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还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圣训》,都强调了女性的地位、自由、权利、自尊心,开始提倡妇女受教育的重要性。《古兰经》中说:“信仰的人啊,你们不要强行把妇女作为遗产继承,也不要胁迫她们交出你们已经给她们的一切东西,除非她们犯有明显的丑事。要善待她们。如果你们厌恶她们,那么,你们不喜欢的一件事,可能安拉已在其中安置了许多福利。”

到了十九世纪,阿拉伯妇女的地位、社会角色都开始有了更大的改变。如果以埃及妇女从十九世纪初一直到现代为例,就可以看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妇女地位的历史发展轨迹。1805年,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埃及人民的力量夺取政权,成为了埃及总督后(1805—1849年),就力图把埃及改变成一个独立的强国。工业、农业、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空前的发展。就教育事业来说,他一方面向西方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一方面聘请了不少的西方学者到埃及讲学。穆罕默德·阿里开始重视埃及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开始建立专门的女性学校,如1832年建立的医学学院。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女性的问题开始浮现,当时埃及的几个著名知识分子都开始关心妇女在埃及社会的地位,如开始提倡女性受教育、工作等各种权利。这场运动最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有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雷法阿·塔赫塔维,有时任埃及穆夫蒂(伊斯兰教典阐释官)的穆罕默德·阿布都,还有当时埃及全国上诉法院顾问卡西姆·艾敏等代表人物。这几个知识分子在他们发表于埃及报纸、杂志以及个人著作中的观点都表现了其对埃及女性问题的支持。特别是卡西姆·艾敏在他的《解放妇女》

与《新女性》等作品中勇敢地对埃及女性受教育、工作、走上社会、摘下面纱、从传统闺阁中解放出来等问题提出精辟意见。卡西姆·艾敏在他的两部书中将埃及女性的愚昧、无知、闭塞和处于受屈辱的地位与整个国家的落后、民族的愚昧联系在一起。这两部作品中,他依照《古兰经》和《圣训》进行论证,他说:“有些人会说我今天发表的这些意见是标新立异。我要说,对,我就是标新立异来了。不过这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标新立异,而是对那些早就该改良的陈规陋习的标新立异。”他的倡议一发出就受到了当时很多宗教人士和知识界人士的批判,在当时的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不管怎么说,卡西姆·艾敏没有白费劲,他的呼吁还是鼓励了渴望革新和自由的人们的心灵,使得埃及社会开始注意到妇女的现实处境,并开始承认她们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接下来埃及妇女参与了1919年的政治革命,开始走上了为个人自由而战斗的道路。

在卡西姆·艾敏关于妇女解放的倡议提出之前,如果妇女的名字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是非常丢脸的事,如有女子想要写作或参与其他事业,是不敢签自己的真名的,一般要用其他的名称来保护自己在社会上的面子。但在卡西姆·艾敏倡导之后就有了几个在埃及妇女解放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女性先驱者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言论。如以“沙漠寻者”为笔名的玛拉克·赫法尼·纳斯夫,她一直坚持妇女的解放与获得各种权利的立场。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性先驱者还有埃及妇女运动的领袖胡达·沙拉威,她主张妇女要有受教育权、男女平等权、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并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妇女联合会(1923年),其主要目的是把埃及妇女解放运动与国际妇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之后,埃及妇女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其结果是1928年埃及开罗大学废除大学女禁,开始接受女学生。在1942年和1950年开办了亚历山大大学与艾

因夏姆斯大学之后,埃及妇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1952年7月23日革命后,埃及终于独立了,成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埃及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终于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各种权利,成为埃及社会的“半边天”。1952年革命之后,在国家获得独立的情况下,埃及女性也慢慢走向了社会,最重要的是埃及男性主流社会开始改变对女性的传统成见,埃及女性从此也闯入了医学、工程、法律等职业界。在文化方面,当时的主流文学,无论是男作家写的作品还是女作家的作品都开始提倡埃及女性各方面的权利,女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心理、劳动、家庭等问题在文学作品里面都开始有所表现。文学作品冲破了泛用浪漫主义手法去写女性的藩篱,开始从现实社会出发,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反映女性的问题与遭遇,将埃及女性的现实问题及生活遭遇与整个埃及社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1960年问世的著名女作家拉提法·扎亚特的长篇小说《敞开的门》是这方面的杰作。《敞开的门》主要以1946年至1956年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占领并最终收复苏伊士运河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莱伊拉冲破种种阻力,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登上政治舞台,与男人们并肩战斗的经历,从个人、社会、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深刻地表现了妇女、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表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是分不开的历史事实。

1973年,埃及的革命使得埃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革命后的种种变化,如多党制、言论自由权等都在埃及女性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上有所反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作家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了这种变化及其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她们对国家、民族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都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她们本身的生活经历,对某些旧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陈旧陋习的不满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担忧,往往使她们

用笔杆做武器,为女性的自由、权利而斗争。这方面的女作家主要有拉德瓦·阿舒尔,她的代表作是《格拉纳达》三部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埃及女性的地位在走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之后,终于走向了光明大道,埃及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开始引人注目。在政治领域,埃及女性担任了国家议会议员、法院顾问、校长、女大使、部长等领导职务;在社会领域,女性建立了女性问题与儿童问题的专门机构;在文化方面,埃及女作家有了创作自由,在文学作品里面开始讨论当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埃及女性地位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同时,她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于女性问题,当今埃及主流社会分成两派,即保守派与改良派。保守派认为女性必须按照传统的习俗去做,不要盲目地走向社会,要以家庭为主要责任,否则会失去作为女性的身份;改良派则认为当今的女性必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要放弃阻止女性发展的传统藩篱,要利用科技成就发展自己,也只有这样她们才会享有“半边天”的身份。我们相信,阿拉伯妇女奋斗到今天,妇女问题有了美好的发展前景,她们将在阿拉伯社会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哈赛宁 译)

艾依曼·绍基:谈到阿拉伯女性,很多人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好几个浑身上下用黑纱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排成一列,跟在一个趾高气扬的大胡子男人身后亦步亦趋,面纱缝隙中露出一双双美丽的大眼睛,虽掩饰不住好奇的神色,却又只能羞涩地把目光投向地面或身边拉着她裙裾的孩子。

低三下四、逆来顺受、深居简出,已然成了阿拉伯女性的代名词。然而地域辽阔的阿拉伯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早在十九世纪,在西方现代化进程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埃及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就把女性教育提高

到兴国利国的高度。其他各阿拉伯国家的女性也相继觉醒,积极争取自由解放,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

一百多年过去了,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虽然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女性已经作为一支中坚力量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绩斐然。

第六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主席、现年五十三岁的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阁下就是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女性。她出身皇室,在科威特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曾留学法国学习国际公法,还获得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民事私法和艾因沙姆萨大学比较法研究生学位,是最早在巴林从事法律工作的两位妇女之一。1997年至1999年,她在国际律师协会担任仲裁和解决争端委员会副主席,是担任这个职务的首位中东妇女。除了在法律领域起到重要作用外,她又于2000年至2004年担任了巴林驻法国大使,并兼任驻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无任所大使。在这一时期,她还担任巴林王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而且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协商委员会成员,并成为巴林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的代表。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是妇女权利的捍卫者,特别是在法律领域。她一直积极参加提高巴林妇女在伊斯兰教法法院地位的运动,倡导开明地理解适用于妇女的伊斯兰经文。她是原巴林律师协会副主席,并曾担任文化、艺术和文学最高理事会成员。她是巴林儿童发展协会、阿拉伯妇女法律网现任成员。历届联合国大会仅有三位女性主席,她是第三位,也是1969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主席,她还是第一位在阿拉伯峰会上发表演说的女性。

另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是奈娃勒·赛尔达薇,1930年生于埃及的她身兼心理医生、作家、妇女运动领袖等多重角色。她二十四岁毕业于开罗哥斯尔依尼医学院,后又获

哥伦比亚大学卫生学硕士,专攻心理健康和文化卫生,曾在卫生部、《健康》杂志社、埃及文化艺术委员会小说部担任公职,是“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主要负责人。1958年,她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旨在批判社会道德的两重性,宣传性与爱、性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深刻揭示阿拉伯妇女不平等的生活命运,把妇女解放和人类自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医生的回忆》《失踪的情人》《她寻找爱》《不求赦免的女人》,短篇小说集《她是弱者》《真诚的时刻》,戏剧《伊普斯》以及专著《妇女与性》《女性即本源》等二十多部作品。虽然由于作品触犯传统禁令,引起过很大争议,但仍然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此外,奈娃勒·赛尔达薇多次作为客座教授赴美高校讲学,并获得多项医学卫生、文学艺术奖。

提到阿拉伯文学就不能不提黎巴嫩女作家梅伊·齐雅黛(1886—1941)。她出身名门,天资聪慧,才貌双全,早年曾在贝鲁特等地求学,受家庭熏陶,其创作在学生时代就已初露锋芒。举家移居开罗后经名师指点,迅速成长,成为现代阿拉伯文坛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二十世纪初阿拉伯男女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她才思敏捷,文风优雅,精通多门外语,作品哲理丰富,代表作有法语诗集《梦之花》,散文集《姑娘的良机》,政论集《平等》,妇女领袖及作家传记《芭希莎·芭迪亚》《沃尔黛·亚琪兹》《阿伊莎·台木利亚》,演讲集《生活之林》,长篇小说《回归的浪潮》等。除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外,她还定期在家中举办文学沙龙,深为塔哈·侯赛因、阿卡德等著名作家、诗人所尊敬。1919年至1931年梅伊主持的沙龙被誉为“民主主义沙龙”,推动了阿拉伯文学和思想的进步。此外,梅伊与阿拉伯文坛一代天骄——旅美诗人纪伯伦之间历时多年的精神之恋,也成为阿拉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为后世留下风格独特的爱情书信,结集为《蓝色的火焰》。这位被纪伯伦评

价为具有“神奇的天赋、广博的知识、良好的审美观”的才女，晚年由于纪伯伦及亲人的相继逝世和生活的艰难，一度住进精神病院，后病逝于开罗，结束了美丽而哀婉的一生。

现代尊奉伊斯兰教教规最严格的阿拉伯国家要数沙特了，虽然近年来沙特政府在妇女问题上有所松动，鼓励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女性至今仍不能与男性随意接触，如果想旅游必须先得到男性亲属的书面批准，驾驶汽车更是异想天开。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却出了一位梦想成为飞行员的女性哈娜蒂·扎克里亚。这位看似普通的女子可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巾帼英雄，当局虽不允许她驾车前往机场，但却阻拦不了她在机场驾驶喷气式飞机冲上云霄。现年二十七岁的哈娜蒂出生在沙特宗教圣城麦加的一个开明的普通家庭，在父母的支持鼓励下，2002年她前往邻国约旦的中东飞行学院进行飞行训练，如今已经成为第一个拿到私人飞行驾照的沙特女性。获得初步资格后，为成为沙特国家航空公司的一名驾驶员以报效祖国，她决定再回到约旦中东飞行学院，取得必需的商业驾照和仪表飞行驾照。终于，沙特国内一家属于法赫德国王侄子阿勒瓦利德·塔拉勒王子的私人飞行公司注意到了这位国内的第一个女飞行员，哈娜蒂成功地与该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在2005年中期开始服务，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商业飞机驾驶员。关于雇用哈娜蒂，一直致力于提高沙特国内妇女地位的阿勒瓦利德·塔拉勒亲王认为是“帮助女性参加工作，使其积极加入沙特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通俗文化是阿拉伯女性较早涉足并得到认可的一个领域，埃及、黎巴嫩等国的一些女歌唱家用东方女性特有的优雅含蓄、细腻真

挚的情感来演绎独具特色的阿拉伯民族音乐，抒发阿拉伯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歌颂，深受阿拉伯人民喜爱、尊崇，她们甚至成为本国乃至整个阿拉伯文化的代言人。埃及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1898—1975)被誉为“东方夜莺”，从来没有一位阿拉伯艺术家像她一样得到民众如此广泛的尊敬与爱戴。她生活在一个人并不尊敬歌唱艺术的时代，认为它是下等人从事的职业，但她用行动扭转了人们的看法，得到了广大民众甚至著名作家、文学家的赞赏与钦佩，改变了歌唱艺术在阿拉伯地区的风格，并使之得到社会的尊敬。此外她博览群书，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本职工作精益求精，据说每首歌曲在正式演出前都要排练三十遍。她的演唱生涯从宗教歌曲开始，渐渐扩展到其他歌曲，但坚决拒绝流行的靡靡之音。在阿拉伯民族面临困境时，她为消除战争阴影，鼓舞人民士气，四处义演募捐，激发了埃及民众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爱国热情。乌姆·库勒苏姆虽已去世，但她的歌声仍然在波斯湾至大西洋的上空飘荡。

黎巴嫩女歌唱家斐露兹是当代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她的歌曲雅俗共赏，其地位无人匹敌，被阿拉伯人自豪地称为“阿拉伯人派往星球的使者”。不同于现代被欧美流行文化同化的一些阿拉伯年轻歌星，她保持着东方女性含蓄婉约的气质，演唱的歌曲也保持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常以爱国思乡的情感为主题，还有的歌曲由阿拉伯著名诗人的作品谱曲而成，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歌迷所钟爱。多年来她还常在欧美数国巡回演唱，独具特色的阿拉伯音乐和铿锵优美的阿拉伯语唱词回响在世界各地。(牛子牧 译)